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春秋穀梁传译注

中华古籍译注丛书

承 载 撰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春秋穀梁传译注

中华古籍译注丛书

承载撰



中华古籍译注丛书

春秋穀梁传译注

承 载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4.875 插页 5 字数 577,000

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,000

ISBN 7-5325-2473-6

B·293 定价:39.80元

前 言

根据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修订而成的《春秋》，向来是中国儒家学派极其重要的一部典籍。它按年、月、日排列，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与鲁国有关的史实作简略的记载，从而勾画了自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 722 年）到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 481 年）这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的风云变幻、世事沧桑。不过，由于它的文字简略，加上在流传过程中的脱漏错简，使得后人对其中的不少内容难以获得准确的理解，因而对有些史实以及文辞的含义出现了许多分歧。所以到了西汉时期，曾先后至少出现过五种依据《春秋》作解释的《传》，这就是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以及《邹氏传》、《夹氏传》。但是，据东汉学者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，“邹氏无师，夹氏有录无书”，“无师”，就是在当时已经没有传授这一学说的经师，“有录无书”，就是只有著录书名，但没有书本流传。《春秋》在西汉武帝时被列为“五经”之一，这样，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左氏传》，也就成了解说《春秋》的三部重要的儒家著作，习惯上将这三部著作合称为“春秋三传”。

“三传”之中，《公羊》和《穀梁》是采用围绕经文，以问答式的文体来作解释，其内容侧重于解说经文的意义，对史实的叙述则比较简略。内容涉及的年代，与《春秋》完全一样。《左传》则不同，它详于记事，间或有少量的议论，这不仅大大丰富了《春秋》经文中提到的人物、事件的详细内容，而且补充了不少经文中所没有的内容。《左传》引用的经文，比《春秋》多出两年，即截止于

鲁哀公十六年,孔子去世时。记事则更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。

一、《穀梁》的作者、创作与传授

《穀梁传》,又称《春秋穀梁传》,也称《穀梁春秋》。它真正的作者,今天已无从考察,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前,即这部著作十分流行的西汉时期,这个问题就已经成为一个悬案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著录《穀梁》时这样记载:“《穀梁传》,十一卷,穀梁子,鲁人。”东汉时的好几位学者,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《穀梁》的作者,认为“穀梁子”就是“穀梁赤”,曾经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学生。桓谭的《新论》、蔡邕的《正交论》、应劭的《风俗通》,都是这么说的。但王充的《论衡·案书》中却说是“穀梁寘”,阮孝绪的《七录》则说是“穀梁俶”。到了唐代,经学家们根据历代的各家之说,依据一些并不可靠的零星资料,又有了新的说法。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时,在班固的原注“穀梁子”下说:“名喜。”后来钱大昭撰《汉书辨疑》时,认为“喜”当作“嘉”。而陆德明在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中则引用糜信的话说,“穀梁赤”是战国秦孝公时期的人。杨士勋在作《穀梁义疏》时,采用了阮孝绪的说法,但“俶”字变成了“淑”字,又说其“字元始,鲁人。一名赤”。单是一个“穀梁子”,就先后出现了“赤”、“寘”、“喜”、“嘉”、“俶”、“淑”这六种不同的名字,真是把后人弄得无所适从了。

不仅如此。由于作者的名字、身份不清楚,又引起了关于这部著作的创作年代的疑问。据杨士勋的《穀梁义疏》中说,“穀梁淑”从子夏习《春秋》,然后据经作传。但是这一说法大有问题。子夏是春秋后期人,如果穀梁淑曾受学于子夏,那么就应当与子夏是同时代或稍晚的人,而他据经所作的传,也应当是由他亲撰,但现在文中有不少征引的语录,既有出于号称“穀梁子”者

的,也有出于明显晚于子夏生活时期的人。如《穀梁》中好几处引用了“沈子”的话,又引用了“尸子”即尸佼的话。“沈子”是战国时人(他的话在《公羊》中也有引用),尸佼是商鞅之师。他们的生活年代,虽难以断定确切的年份,但大大晚于子夏当是没有问题的。桓谭《新论》中说:“《左氏传》遭战国寝藏,后百余年,鲁人穀梁赤作《春秋》,残略多有遗文。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,弥失本事。”他认为“《春秋》三传”中,《左传》最早出现,《穀梁》与《公羊》差不多同时出现。不过这一说法的可靠性还是个疑问。陆德明在对“三传”次序作出解释时说,“左丘明受之于仲尼,公羊高受之于子夏,穀梁赤乃后世传闻”。将《穀梁》定在“三传”的最后,当然也考虑到创作年代的先后,但是他的依据却已无从考证。今天的不少学者,在对比了《公》《穀》两传内容的基础上,认为《穀梁》创作定型是在汉景帝时期,甚至还要晚些。此说虽然有些保守,但在没能取得更为有力的证据前,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说法。

关于《穀梁》在汉代以前的传授历史,也一如其创作年代一样不可确定。杨士勋说,穀梁淑受经于子夏,作《穀梁传》,传于荀子,荀子又传于鲁人申培。但如果按照陆德明引用糜信的说法,穀梁赤与秦孝公同时,那么,秦孝公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61年到公元前337年之间,但荀子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3年到公元前238年之间,鲁人申培到西汉的武帝初年是“年八十有余”,这样,从子夏到穀梁子,再从荀子到鲁人申培,无论如何是连接不上的。中间是否存在其他的传授者,因无明文记载,不得而知,但仅据这些记录,足可以看出,从《穀梁》成书,到西汉初年之前的这一段传授历史,均不可信。

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记载《穀梁》传授时说:“瑕丘江生为《穀梁春秋》。自公孙弘得用,尝集比其义,卒用董仲舒。”这是关于汉

代《穀梁》传授的最初记录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的记载比较详细,说瑕丘江公(即江生)受《穀梁》于鲁人申培,同时又学《诗》,武帝时以《鲁诗》征为博士,太子本来学《公羊》,私下又学《穀梁》而善之。当时《公羊》得势,《穀梁》学者很少,只有鲁人荣广、皓星公从江公学《穀梁》。荣广的学生有蔡千秋、周庆、丁姓,蔡千秋同时又从皓星公学。宣帝时,诏选十人从蔡千秋学,千秋死后,征江公之孙为博士,诏刘向从其学,并协助江公之孙教授十位学生。江公之孙死后,再征周庆、丁姓,共同教授十人的学业。在宣帝甘露三年(公元前51年)的“石渠阁会议”上,《穀梁》被立为官学,周庆、丁姓分别为《穀梁》学的博士,于是《穀梁》开始盛行。丁姓的学生有申章昌。蔡千秋的《穀梁》学,到了他的学生尹更始开始发生变化。尹更始曾经参加了与《公羊》学者的辩论,同时又学《左传》,后来他变通“二传”内容,取其合理者写成“章句”,传其子尹咸,以及翟方进、房凤。江公之孙的学生中,有胡常传其学,授萧秉。至此,《穀梁》一家又分出了尹、胡、申章、房氏这四种大同小异的学说。其他曾经学习过《穀梁》的还有侯霸、梅福、以及庸谭(又学《古文尚书》)、严彭祖(以《公羊》为博士)、夏侯胜(以《今文尚书》为博士)、韦贤(以《鲁诗》为博士)等。这样,在整个西汉时期,《穀梁》学实际上是从中期以后才开始盛行起来的,直到西汉末年,流传逐渐广泛。

根据这样的一段传授历史,不难看出,《穀梁》虽然也是以《春秋》为基本依据的,但它的影响在宣帝之前远远不如《公羊》,要不是宣帝即位之后对《穀梁》的特别关注,也许它还会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。西汉时期经学的发展,极受政治局势的左右,《穀梁》的传授流布,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。这一点,将在第三部分谈到。

二、《穀梁》与《公羊》的异同

由于相传《穀梁》与《公羊》都是以孔子的弟子子夏为祖师的,而且它们的行文体例也的确非常接近,再加上两书都在西汉时期被立为学官,因此,大都认为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,将它们看成是一个体系中的不同学派的著作。

如顾颉刚先生说:“‘穀’与‘公’为双声,‘梁’与‘羊’为叠韵。”这是从书名的音韵上揭示两者的关系。另外,《穀梁》与《公羊》在内容方面的雷同也为数不少。如“隐公五年”经文:“初献六羽。”《公羊》说:“初献六羽,……讥始僭公也。……天子八佾,诸公六,诸侯四。”由此说明鲁隐公作为诸侯,他以“六羽”用于祭祀仪式,是越礼之举了。《穀梁》也说:“舞夏,天子八佾,诸公六佾,诸侯四佾。初献六羽,始僭乐矣。”两者的解说如此相似,不能不认为它们之间具有前后承袭的关系了。西汉时把用当时流行的字体来书写的儒家典籍称为“今文经”,把用汉以前的字体(如战国时期的大篆、秦代流传的小篆之类)写成的儒家典籍称为“古文经”,当时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两传的读本都用西汉时流行的文字书写,所以在后来发生的经今古文之争中就都将它们作为今文经的著作了。然而,这些并不能证明两传真的就是同门所出,一脉相承的。进一步对照两者的内容,就可看出,《公羊》与《穀梁》之间的异同,不只是同一师门不同学派的那种大同小异或互有详略,而是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。

其一,貌似相同,实则有别。

例如,《春秋》“隐公二年”经文:“滕侯卒。”《公羊》说:“何以不名?微国也。”根据《春秋》记载国君去世的通例,凡是属于正常死亡的国君,都要记载其名,但这里没有记载滕国国君的名,

《公羊》认为由于滕国是弱小之国，所以就不记载他的名。《穀梁》则说：“滕侯无名，少曰世子，长曰君，狄道也。”此说同样毫无根据，但比《公羊》又多出“狄道”的解释，将“无名”的原因与“滕侯”个人的政治行为联系起来了。

再如，“文公二年”经文：“子叔姬卒。”《公羊》说：“此未适人，何以卒？许嫁矣。”“叔姬”虽然是鲁国国君的亲属，但其没有成为其他国君的夫人，所以照例是不能记载其去世的，这里予以记载，必有道理，于是《公羊》造出“许嫁”，也就是已经订婚的事实，作为解释。《穀梁》说：“其曰‘子叔姬’，贵之也。公之娣妹也。其一传曰，许嫁以卒之。”最后一句，简直就是《公羊》的翻版，但仅仅作为传言，以备一说，而《穀梁》的本意是为了说明“子叔姬”地位的高贵，称她为文公之妹。这一说法是否确实，本身就有疑问，但《穀梁》却将此作为“子叔姬”身份高贵的依据，加以强调，这是《穀梁》一贯宣扬的尊贵卑贱之义的发挥。

这样看来，《穀梁》的有些观点，明显地是沿袭了《公羊》学说，而《穀梁》的解说中更表现出一种实用的政治色彩。

其二，释义不同，褒贬有别。

例如，“隐公五年”经文：“九月，考仲子之宫。”《公羊》说：“‘考宫’者何？‘考’，犹入室也，始祭仲子也。桓未君，则曷为祭仲子？隐为桓立，故为桓祭其母也。然则何言尔？成公意也。”“考”是将仲子之神主送入祖庙，以供祭祀。“仲子”是当时尚未立为国君的桓公的生母。隐公的这一行动，是为了实现其将要让位于桓公的心愿。虽然这一说法的根据还有待考证，但还符合情理。《穀梁》则说：“‘考’者，成之也。成之为夫人也。礼，庶子为君，为其母筑宫，使公子主其祭也。於子祭，於孙止。‘仲子’者，惠公之母。隐孙而修之，非隐也。”对“考”字的解释与《公羊》不同，对“仲子”的解释也不同，对隐公这一行动的意义解

释更加不同。议论中充满了对隐公的责难之意,说他越礼祭祀“仲子”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。

再如,“僖公二十二年”经文中记载了宋襄公与楚成王的“泓之战”,此战由于宋襄公不合时宜地一再贻误战机,终遭惨败,然而,《公羊》却对此大加赞扬,说宋襄公的行为“虽文王(即周文王)之战不过此也”,这简直就是“圣战”了,评价可谓崇高。但《穀梁》非但对宋襄公此举大不以为然,还提出一套作战原则,说“倍则攻,敌则战,少则守”,以此来抨击宋襄公的愚蠢。平心而言,《穀梁》的这一解说比《公羊》要来得实际,但如果将两书作为同一系统中的不同学派来看的话,这其中的褒贬差别就显得太大了。说两者同出一源,实不可信。

还有一例,“宣公十五年”经文记载:“冬,螽生。”螽,是一种侵食谷物的害虫。这条经文书于鲁国实行“初税亩”措施后,因此《公》、《穀》对此都有评论。《公羊》说:“未有言‘螽生’者,此其言‘螽生’何?螽生不书,此何以书?幸之也。幸之者何?犹曰受之云尔。受之云尔者何?上变古易常,应是而有天灾,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。”认为这是与鲁国变易古制,实行初税亩有关。根据《公羊》的看法,如果变易古制,就会遭到上天的谴责,降下灾难以为惩罚。现在上天已有这样的表示,所幸还未形成灾难。传文中“幸之”一意,与《左传》同。这一解释,是《公羊》灾变思想的体现,但它在此并没有将这一思想发挥到极点。《穀梁》的解说是:“螽非灾也,其曰‘螽’,非税亩之灾也。”话比《公羊》要少得多,但意思却很明白,认为经文记载“螽生”的事实,不是因为实行“税亩”的关系,“螽”也并不是什么灾害。《公羊》对“初税亩”持有贬意,虽然批评比较谨慎,但认为“税亩”与“螽生”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;《穀梁》则完全否定“螽生”与“税亩”的关系,这是对《公羊》、《左传》的反驳。

如此说来,对于同一条经文,常常是《公羊》有一套说法,《穀梁》又有一套说法,有时《公羊》予以赞扬的,《穀梁》却不以为然,甚至反其道而行之,大加贬斥。这就不难表明,《公羊》与《穀梁》非但不可能同出于子夏之门,而且《穀梁》的成书还极可能更晚于《公羊》,属于西汉时期儒家的另一派别。《公羊》出于子夏之门的说法,已经是大可怀疑了,如果再把《穀梁》也归入子夏门下,岂不更有自相矛盾之嫌了吗?

三、《穀梁》与封建政治

《穀梁》在西汉初期,还只是民间传授的一家之学,不仅治其学说的人不多,就是社会影响,也远远不及其他儒家著作,尤其是不如与它同解一经的《春秋公羊传》。到了西汉中期,才开始兴盛起来。但是,它的兴盛,却是与封建帝王的统治需要密切相关的。

汉武帝根据封建统治的需要,顺应当时学术发展的形势,采取了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政策,将《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列为“五经”,并为此配备了专门从事教授经书、顾问国政的博士官。这一措施的结果,刺激了当时儒家学说的迅速发展,于是,围绕着这五部经书的解说,也出现了许多在方法、观点上大同小异,乃至截然不同的学派。当时的《春秋经》,本来只有《公羊》学一家的学者被列为博士,凡是提到《春秋》,其实一般就专指公羊家而言,但是到了汉宣帝时期,由于宣帝“好《穀梁》”,提拔了不少治《穀梁》学的经师为官,“由是《穀梁》之传大行于世”。

汉宣帝何以在群经之中青睐《穀梁》?据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,汉宣帝提倡《穀梁》学说,态度是十分慎重的,因而采取の方

法也与汉武帝时提倡经学有所不同。宣帝从即位之初,就已经开始注意到《穀梁》学说中某些对封建统治有利的思想了,因此,他一面向其他的经学之士询问《穀梁》大义,一面诏选学子,让他们师从《穀梁》学者受学。他还借补充《春秋》学博士的机会,让传《穀梁》的学者担任《春秋》博士。需要指出的是,这时“五经”中除了《诗》有三家不同学说的博士之外,其余各经尚未正式分家,武帝时立《春秋》博士,其实是将这一殊荣单独给予了《公羊》学者,而《穀梁》学者则根本无力问鼎博士之位。现在宣帝让《穀梁》学者担当这一职务,并教导学生,实际上就意味着《穀梁》学已经开始进入官方。当然,这时的《穀梁》学者毕竟还不是独立的一家之说的博士,只能与《公羊》分享“《春秋》博士”的名份。不过,比起在武帝时《穀梁》学的民间传授的地位,已经高出不知多少了。既有了自己的博士,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太学招收学生,于是,《穀梁》经过了十余年的积蓄、准备,终于在宣帝甘露元年(公元前53年)时,有了与《公羊》学者“大议殿中”的机会。此次会议,由宣帝命当朝太子太傅萧望之召集《公》《穀》学者,“平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同异,各以经处是非”。此次会议,《公羊》学者有严彭祖、申輓、伊推、宋显,《穀梁》学者有尹更始、刘向、周庆、丁姓参加。在辩论中,萧望之多附和《穀梁》学者,最终是《穀梁》战胜了《公羊》。这样,也就奠定了《穀梁》作为《春秋》的另一派别而独立存在的基础。

《穀梁》的学者,固然在宣帝时得到特别的重视,但他们在政治上却并未因此而获得高位,这是与《公羊》学者不同的地方。不过,宣帝在他的政治生涯中,却明显地对《穀梁》所宣扬的宗亲礼制表现出特别兴趣,并将其贯穿于统治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之中。

《公羊》与《穀梁》都讲宗法,但出发点不同,观点也迥然有

别。《春秋》“隐公元年”经文：“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。”《公羊》在逐字逐词地解释了元年、春、王、正月、王正月之后，将其意义归结到“大一统”的高度，然后才转入对经文“不言即位”一事的阐述，其结论是“桓幼而贵，隐长而卑”。这一解释，承认了隐公虽为国君，名份却不正，从而为后来桓公弑君继立提供了借口。《穀梁》却用“虽无事，必举正月，谨始也”十个字解释了经文以后，就转入对“不言即位”的说明。认为：隐公虽然是因为不愿违背父命而即位的，但这一做法却有“扬父之恶”之嫌，特别是他欲让位于桓公的想法，更是“成父之恶”，是置“千乘之国”的前途于不顾的“小道”。《公羊》宣扬的是“大一统”的道理，《穀梁》则在肯定隐公的同时，也批评他忽视了宗法情谊。

宣帝是武帝的曾孙，但少年时期却是在民间度过的，学习过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儒家典籍，史称其“不甚好儒”，只是因为他不大喜欢“缘经饰事”的儒术，而对儒家真正崇尚的礼乐制度，却是深得于心的，所以史书中又说他“慈仁爱人”。就在他即位之后对《穀梁》表现出很大兴趣的同时，朝廷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也充分体现了宗法礼制的思想。如宣帝地节四年五月的诏书中说：“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虽有患祸，犹蒙死而存之，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！自今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”为了表示亲孝仁爱，连有意藏匿罪犯都可以不予追究，这真是“孝子”“不扬父之恶”的具体运用了。

武帝统治的后期，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诸王势力的威胁，因此不得不对此进行大规模的清理。治淮南王狱时，广事株连，被杀者多达数万人。在巫蛊事件中，又与太子兵戈相向，骨肉情恩半点全无。这样做的结果是，朝廷统治固然得到了加强，但是宗室与皇帝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，社会矛盾也并未因此减弱，反而有日益加深的趋势。宣帝长期生活在民间，对这些现象

不会陌生,因此他即位以后,利用武帝崇尚《春秋》的基础,转而偏爱讲究礼制伦常的《穀梁》,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一种选择。

宣帝提倡《穀梁》,又是在培养其社会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。他深知《公羊》学说的力量之强大,所以并不立即与此作正面的交锋,而是采取先用后立的方式,在实践中让《穀梁》学说得到发展,建立较为深入的政治和社会基础,使其立为“官学”,有一种“水到渠成”的效果。这样,也就避免了投机者趋之若鹜,取悦当朝的弊病。这一点,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他即位不久的询问《穀梁》大义,到征召《穀梁》学者为《春秋》博士,再组织经学之士议论《公》《穀》同异,最后才正式立《穀梁》博士的过程,就完全清楚了。

《穀梁》与《公羊》一样,在记载史料方面,不如《左传》详尽,在行文语言方面,更难以与《左传》相提并论。那么,它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呢?概括地说,就在于它对《春秋》经文意义的发挥。清人皮锡瑞在《经学通论》中说:“《春秋》有大义,有微言。大义在诛乱臣贼子,微言在为后王立法。惟《公羊》兼传大义、微言。《穀梁》不传微言,但传大义。《左氏》并不传义,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《春秋》之义者。故‘三传’并行不废。”但是,传义有传义的艰难之处。既然《穀梁》的来源比较混乱,那么它所发挥的“大义”也就未必有一个统一的支配思想。于是就出现了时而沿袭《公羊》,时而吸取《左传》,时而又通过臆断来自抒其见的情况。但这样一来,正好弥补了《公羊》、《左传》的一家之言,可以比较多地使后人了解到当时人的思想、观念。所以,后世学者提到《穀梁》,也还是给予较高的评价。如清人钟文烝在《穀梁补注序》中,综合前人的议论,归纳出这样几点:一是善于解经,二是集中了“三传”中的大部分道理,三是某些“大义”深得《春秋》的精髓。而它的语言特点,对后世学者也有影响。如柳宗元曾在

其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说,自己的文章有“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”之处。这样看来,《穀梁》倒也还有它独特的地方。如果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,那么,研究汉代前期的统治思想,《穀梁》无论如何是一部不可忽视的著作。

凡 例

一、本书经、传原文采用清阮元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为底本,分段、标点参考《四部丛刊初编·经部》所录晋范宁《春秋穀梁传集解》、近人黄侃手批《白文十三经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)。所作解说,以范宁《集解》、杨士勋《春秋穀梁义疏》为主,并参考各种研究著作,诸如清人柳兴宗《穀梁大义述》、许桂林《穀梁释例》、钟文烝《春秋穀梁补注》、今人傅隶朴《春秋三传比义》、刘世南《春秋穀梁传直解》等。有的专门问题,还参考了清人陈厚耀《春秋长历》、刘逢禄《穀梁废疾申何》、赵坦《春秋异文笺》、康君谟《穀梁礼证》、崔适《春秋复始》、近人冯骥《春秋日食集证》等。为免繁琐,一般均直接采用其结论,不展开讨论。

二、传文依据《春秋》经文的排列次序,逐年、逐月、逐日地予以解说,《春秋》经所涉及的鲁国十二公,以每公为一章,均以自然句为段,故前人有《春秋》“断烂朝报”之说。但原文如此,今不再改动,以免影响原貌。有经无传者,只译注经文的有关史实;经、传俱全者,两者皆作译注,并在注释中简要说明传文意义。

三、《穀梁》解经,长于“大义”,对于史实多有忽略。特在译注时适当以《左传》为基本依据,参照其他史籍,稍予补充,以明“大义”的来龙去脉,亦便于读者斟酌传文解说的得失。

四、《春秋》三传,互有得失,各自所引经文,或因传抄之误,

或因方言关系,或因授受缘故,文字亦间或不同,故译注中参照其余二传,予以一一说明。一则可见《穀梁》本身的特点,再则得以了解其余二传的情况,参酌之中,亦可加深对《春秋》经文的认识、理解。

五、《穀梁》解经,固有从《公羊》、《左传》之处,但也多有自己的发明,瑕瑜并存,不可一概非之。故特于注释中指出,并作简要的分析。其间尽量采用为学术界公认的观点,为节省篇幅,一般不标明详细出处,遇有比较特殊的一家之说,则予以说明。其出处除首次注明全称外,此后均用简称。

六、经、传文句,大都简之又简,不易掌握其含义。译注时凡能在译文中体现其准确意思的,尽量不再出注,以省篇幅。对于光凭译文而难以理解的,则采用注释与译文相弥补的办法,以便阅读时参照理解。

七、译注文字,力求准确、简练、通顺。难字以汉语拼音字母注音,标出音调,有的字另加同音字。个别无法简化的繁体字,一仍其旧。如“穀”字,在作传名及某些地名时,只能用繁体,不可简化。通假字一般不注音,只注出同或通某字。人名、地名,均作简要说明。一般情况下,重复出现的人名、地名,只在首次出现时予以注释,倘与经、传内容关系密切,再另行出注。各段(或句)原文前,均以数字标出顺序,格式为:×/×.×,即表示“某公/某年.某段(或句)”,以便检查重复出现多次的同一注释。译文以直译为主,便于保持原文的风格。但为通达起见,有时亦作适当润饰。

八、经、传文字,距今年代久远,流传中必有错漏之处,凡是后人已经指出者,均在注释中予以说明,但译文一仍其旧,以存原貌。

九、《穀梁》解说《春秋》,本身又作为经典流传,前人囿于成